



鲁班木作与北京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市民社会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1)01-0051-08

●董晓萍

[摘要] 本文使用清宫造办处木作档案和田野调查资料等,讨论我国手工技艺的行业文化而不是技术文化,重点对北京木作进行个案研究。

[关键词] 清宫造办处木作档案;行业文化;城市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工匠技艺绝世而社会文化史地位被忽略,这是一种不小的反差。而他们中间又有多少人能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共享历史经验,也是值得研究者反思的问题。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对中国工匠社会角色的关注要热情得多,他们出版了不少著作,提供了不少可资参考的观点和概念,包括对木作技术产品和使用者身份的认同①、对木作空间利用风俗的自然保存和文化保存条件②、对中国人使用木器的身体起卧

[基金项目]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清代民俗文献研究”的子课题成果,项目编号 01JAZJD840002,此文为作者书稿的一节。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博硕士研究生蔡锦碧、毕传龙、李灵曦、陆臻里和刘尧晔随我参加了本项目的历史档案搜集和部分企业调查工作,其中蔡锦碧主要负责木作,谨说明和致谢。

① 家具与使用者身份相关的观点,参见[德]利普斯(Julius E. Lips)著,汪宁生译.事物的起源(修订本)[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24~25.

② 布罗代尔很早讨论中国家具的空间利用风俗问题,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著,顾良等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92.337~338.

姿势的社会分类^①以及对这类普通人文明的构建^②等等。但是,由于中西学术背景的不同和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研究还不免是远方天才式的观察,与我国工匠社会“隔行”。而实际上,我国学者自己利用社会史、技术史和民俗文化资料,对工匠社会的内外部作研究,同时进行国际化视角的讨论,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与以往的相关讨论有所差异,以往的问题焦点是技术文化(technical culture),侧重点是产品,主要考察工匠制作的产品及其技术过程和文化观念;本文的问题焦点是行业文化(professional culture)^③,侧重点是人,探讨人怎样传承手工技艺和相关的文化观念,北京的鲁班木作正是这种个案。

鲁班木作与北京城市史关系密切,鲁班造故宫角楼的传说已成为北京城市的历史记忆。^④北京城市生活装饰传统和土木建筑的物质基础,也使鲁班木作在北京城市构成中成为社会角色,而不仅是技术角色。鲁班木作对塑造北京的城市史、皇家宫廷艺术、市民社会文化分层和日常生活样式等,都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

本文重点讨论清代至民国时期北京鲁班木作行业文化。从目前已搜集到的资料看,在北京的历史上,从宫廷皇室、上层社会到市民阶层,都与鲁班木作有联系。北京寺庙中的鲁班碑自清乾隆中期至今,也有二百五十年左右的历史。木匠群体崇祀鲁班碑和鲁班馆的活动,持续到近年。少数鲁班木作作坊现在是北京的老字号企业,是鲁班木作现代传承的样本。开展本项研究,可以从鲁班木作的个案视角,开展北京市民社会史与民俗文化的微观研究,包括北京历史城市与木作工匠组织的结构方式,木作工匠对北京清代皇室艺术的塑造,对北京城市手工技艺行业文化遗产的营造和工匠市民化的过程等。不过,需要承认的是,相比较而言,鲁班木作行业与市民社会史的关系的资料是十分缺乏的。在木匠对城市环境依靠程度高,又受城市社会变迁影响大的作坊的资料中,往往记载城市社会政治变迁的多,记载工匠活动的少,何况这种社会政治变迁与行业文化传承也没有唯一的路线,很难追踪不同木匠作坊、不同变迁路线之间的直接联系。根据这种情况,我们需要采取多种类型的资料,使用多角度的比较方法开展研究。以此为前提,本文主要以北京龙顺成(大木作)、工艺木刻厂(小木作)和宫灯厂为个案作讨论,^⑤主要阐述工匠社会史和行业文化的资料使用原则、研究方法和初步观点。

① 布罗代尔指出中国家具样式依据身体蹲、坐姿势分类,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著,顾良等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92.341.

② 关于技术文化的研究观点,详见[英]白馥兰(Francesca Bray)著,江湄、邓京力译.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③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与法国高等社会学学院合作开展北京行业文化研究,研究自2006年启动,已经4年,近期出版著作参见[法]蓝克利主编.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究:技艺和行业知识的传承与功能[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④ 北京的鲁班传说很多,例如:黄勤等搜集.角楼[A].张紫晨,李岳南编.北京的传说[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25~29.

⑤ 由于三家原为一个企业,为集中讨论题旨起见,本文以下暂统称“龙顺成”。



北京龙顺成,位于北京市崇文区鲁班馆胡同和晓市大街,曾长期是清宫造办处木作传承的代名词。它经历清代和民国,延续至今,在民国中期成为北京建筑业同业工会的会长单位、经理单位和主要理事单位。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经历种种作坊变迁路线,现龙顺成划分为三块,即北京市龙顺成中式家具厂、北京工艺美术刻厂责任有限公司和北京宫灯厂,但北京鲁班木作的老字号企业品牌仍以龙顺成命名。

还要交代的是,我国木作史料可以上溯至先秦,北京的鲁班木作史也不会自清始,所以龙顺成肯定不是一个面面俱全的例子。龙顺成个案的价值是,在北京清代至民国时期城市建设的进程中,在北京历史城市百年变迁中,在城市工匠与市民社会史的关系难以定位的矛盾和争论中,龙顺成成为一种现实存活的社会事实,并保留了形式多样和大体可以利用的资料。

一、资料范围与处理原则

龙顺成的资料大体有六方面:①北京清代地方志,特别是《日下旧闻考》和《光绪顺天府志》,都对鲁班碑所在寺庙有记载。②寺庙会馆史料,其中有关鲁班馆和晓市大街的木匠组织活动记载,自1848年至2006年,约158年。③碑刻史料,其中有关鲁班馆和晓市大街的碑刻,自1848年至1911年,共63年。④行业档案,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宫造办处档案,北京档案馆保存的工商行业档案、同业工会档案和户口档案,逾百种。⑤市区政府与企业合作搜集整理的现代行业调查资料。⑥工匠口述史,我们的调查工作与崇文区政府和龙顺成企业合作进行,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企业资料,③以及工匠传承人的访谈线索。④

北京鲁班木作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既考虑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开展北京城市工匠行业文化调查时,被调查市区对行业技术和行业组织中的微观文化现象和特殊信仰观念的控制、排斥和保护、利用等,也考虑处在不同田野关系中的企业人和工匠传承人所具有的不同看法,如控制者、合作者和观望者的不同看法,还要考虑到改革开放后政府、市民和工匠对传统行业文化逐步增加的反思性知识和多元价值人群对话的变化,注意城市文化分层和社会分层所经历的相似相融。

在本项研究中,在建立资料系统方面,关注木匠行业和城市社会史两方面的知识所具备

①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M](清乾隆五十三年内务府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3.873.(清)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M](清光绪十五年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7.354.

② 北京市崇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崇文卷)[M].2007.

③ 提供人:邸宝忠,男,北京龙顺成中式家具厂办公室主任。搜集人:董晓萍、蔡锦碧。搜集时间:2009年8月11日。搜集地点:北京龙顺成中式家具厂。

④ 在对清宫造办处木作行业现代传承的调查中,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曹海平和邸宝忠,工匠传承人张启生、种桂先、刘更生、马慕良等师傅曾给予重要帮助,谨致谢。

的文化和社区独特性;同时,在资料利用和工作评价上,维护行业木匠的知识权利。我们十分小心地讨论曾被压抑的行业知识和被开放唤醒的文化遗产知识,尽可能注意以保持传统行业文化和行业产品资源的稳定性为主的价值诉求。我们将搜集资料和保护城市历史遗产两者,作为互相协调,达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纽带。这些观念和方法的调整,促使我们的资料搜集工作和相关研究更具有现实操作性。

二、北京清代至民国时期鲁班木作的工匠市民化

根据清代中叶以后的资料记载,在北京城市社会史的发展中,木作工匠因国家和城市管理者的需求和欣赏,也因市民的认可和接纳,进入社会各阶层,并有独立的阶层管理、行业组织、技术操作中的文化规矩和手工产品。他们老家在农村,安葬在城市,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市民化过程十分复杂,由此形成的行业社会网络和城市文化特征,也给后世社会带来了影响。

(一) 鲁班碑、庙、馆的术语与鲁班木作的组织流动和行业稳定

在本文中使用的核心术语,如鲁班碑、庙、馆,是指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在北京地方史志、会馆文献和碑刻资料集中所收录的,在清代至民国期间鲁班庙馆中所存的,为木匠群体所使用的词语。由于这些词语是在不同社会、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行业环境中不同阶层人员所使用的,这使它们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具体含义,还会随着具体时间、地点的变化发生具体的词意变化,所以,现代人看来相同的行业词语,在它们被具体使用的过程中,也会有具体含义的差别。对于此点,以往学界不大注意,只管把这类历时已久的词语拿过来使用。其实直接使用它们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容易在学者的“手术刀”下同一化,失去原来携带的微观文化要素。在本项研究进行过程中,我们已编纂了木作行业数据库和数字辞典,建立了分析北京地方文献和口头传统所保存行业词语的不同含义的语料库和分类标准,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①我们主要通过北京地方文献和木作口头传统用语模式所保存的城市行业文化史和市民城市史记忆及其所体现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稳定性和持续性,提取这些术语并开展研究。这种工作前人关注得不多。

北京木作鲁班碑,共 32 通,最早的 1 通是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五月朝阳区东岳庙公输仙师殿碑,最晚的 1 通为民国十六年(1927)四月朝阳区东岳庙鲁班会碑,跨时 208 年。其他北京内城的鲁班碑,如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西城区旧鼓楼大街大觉寺鲁班碑^②,清同治十一年(1872)西城区旧鼓楼大街大觉寺鲁班圣会碑^③,也值得研究。但从实际调查看,北京木作组织主要还是在崇文区鲁班馆活动,因此,在本项研究中,主要使用崇文区鲁班馆的清

① 清宫造办处木作数据库的数据采集、数据库填写和数字辞典编撰,由我指导博士生蔡锦碧同学完成。

②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M](第 76 卷).郑州:中州出版社,1991.32~33.

③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M](第 84 卷).郑州:中州出版社,1991.26~27.



末鲁班碑。^①

鲁班庙馆,为统称,其中包括鲁班庙、鲁班祠、鲁班馆、公输祠和依附在其他大中型寺庙中的鲁班殿、公输仙师殿等不同说法。本文使用“鲁班庙”的概念,因为它不属于以往行业用语中的任何一种,不受传统词义差异的局限;此外,它能概括木作的行业信仰活动,这是更重要的。北京档案馆藏民国寺庙档案记载鲁班馆和晓市大街寺庙九种,另有同业公会档案和会馆档案(1936,1942,1945,1947)所记七种。由这些档案看,结合调查资料,木匠实际上不是单独崇祀鲁班寺庙,而是在社区佛道寺庙群中祭祀鲁班。他们是社区寺庙群的建造者和维修者,社区寺庙群也是他们所在社区管理全神的处所。

(二)在社区庙祠向同业公会转型中建立行业权利

北京木作同业公会由鲁班庙馆转化而来,同业公会帮助木作行业建构了城市社会活动空间,建立了行业权利。在鲁班碑和鲁班庙馆的资料中,记载了清末至民国时期涉及木作行业权利的几个问题。

行业公产的保存、分配与股权。精忠庙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碑记载,鲁班木作实行股份制,对公地、公产和公共盈利按股份进行分配,集体保存财产。但碑上不写木作分配公产的细节,民国档案中却对此有所记载,工匠口述史也能以个人经历的方式介绍具体过程。综合这些资料看,木作的股份分三股:东股、空铺底和西股。龙顺成创始人清宫造办处工匠,在鲁班馆的同治碑中有落款,这个落款就是一股,为股东。这一股是永久股,可以由后人无条件世袭,这样能避免清宫工匠后人在失去手工技术能力后,或遇到传男不传女的行业风俗束缚后,失去经济来源。一旦他们的手艺失传,他们也还是股东,此称“空铺底”。其他人,包括有财力的投资木匠,拥有西股,也称“人力股”。这些因为,木匠行业是合作组织,股东都需要雇佣普通木工做工,那些聪明能干的木工,可以被允许加入人力股,得到少量的盈利,作为奖酬。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的西股打倒了东股的“资本家”,自己当了股东。

工匠终老留城的权利。据北京民国户口档案记录,鲁班馆住户101户,都有城市户口,但有房产权者仅4户,其余都是租赁住户。每间房住师傅徒弟五六人、六七人不等。工匠年老后,是名匠或任铺长者,可仍留下,在作坊中指挥徒弟干活,如档案中记载一位程某,1864年生,89岁时还单身住在鲁班馆中开业。木作公会为木匠在城里购置“义地”,有两处,分别在先农坛和木樨园,都是公产,用于安葬故去工匠。鲁班馆精忠庙清光绪二十五年碑有对先农坛义地的记载。到宣统三年立碑时,公会仍宣布再购木樨园以养老:“再启者,京师五城、海甸、东直、朝阳大木雕作会末等,拟在永定门外木樨园置设义地一段,计地粮

^① 北京崇文区精忠庙鲁班殿碑,包括:道光二十八年(1848)八月精忠庙鲁班殿碑,同治元年(1862)六月初三精忠庙鲁班殿碑,光绪三年(1877)四月精忠庙鲁班殿碑,光绪二十年(1899)五月精忠庙鲁班殿碑,光绪二十八年(1902)精忠庙鲁班殿碑,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精忠庙鲁班殿碑,宣统三年(1911)三月精忠庙鲁班殿匾额,宣统三年(1911)六月精忠庙鲁班殿碑。碑刻资料与北师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同法国远东学院合作项目“北京寺庙碑刻与社会史:数据库”共享。另见彭泽益选编.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另见北京档案馆藏同业工会碑刻档案。关于精忠庙鲁班碑刻内容的分析,另见董晓萍.北京传统木作碑刻分析[M](打印稿).2009年8月21日,第3~12页。

尺四亩八分,以为行中人亡故长眠之地也。以上二则,今已宣明,以便行中人观睹,此启。是以敬。”也有告老还乡的木匠,但木作公会要在他们久去不归后,在户口登记上注明是本人自己的选择,^①才能撤销其待遇。清代造办处对工匠实行养退制,鲁班馆公会一直为工匠保留了这种权利。龙顺成的木匠告诉我们,他们祖辈都是这样,不愿还乡。高级木匠的手艺回乡也用不上。

三、清宫造办处木作的现代延续与行业城市化

北京传统木匠身怀绝技而生活清苦,但他们崇尚手艺、安贫乐道,为手上的独特技艺而痴醉。在精忠庙宣统三年(1911)碑上写道:“名振古今,乃心精而术巧,艺传永久。”这通清碑透露,有些行业观念到20世纪初还在流传,即“技法”、“精巧”、“术巧”和“规矩”。^②

龙顺成木作,虽历经社会变化,却仍保留了制材、用料、划线、开榫、凿卯、起线、雕刻、组装和烫蜡等传统工序,其木活以精巧严密的榫卯结构,木器造型的民族形式,龙凤、葫芦、蝙蝠和缠枝花卉等民俗浮雕装饰见长。现企业代表作有紫檀五开光如意纹绣墩、花梨四出头官帽椅、黄花梨圈椅和金丝楠朝服大柜等,享有盛誉。行业现代传承的精神支撑是对清宫造办处木作的历史认同感。

清代造办处木作有历史档案,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③清宫造办处隶属清宫内务府,承办皇宫内部需求的观赏工艺品、建筑装饰、宗教祭祀用具、日用器皿等的木工制作,一般由皇帝亲自传谕,内务府官员承办,调集皇宫所在都城北京的著名工匠或调集国内名匠制作。造办处负责记录组织和管理工匠群体、贮存和配送工匠制品的全过程,其中有关工匠技艺评估、工匠师徒传承网络、工匠制品的产地网络、活计工期、民俗功能、工具原料、社会背景和中外技术交流等内容,是本项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外,我们查阅了北京档案馆藏民国至建国初期工商档案(1949~1956)70种;查阅了北京档案馆藏北平市政府警察局外五分局户口档案(1936,1947~1948),共查阅1072户,涉及工匠643人,包括龙顺成工匠263人。我们综合分析龙顺成的书面文献和档案以及对木匠的访谈资料,可以看到,北京鲁班木作对清宫造办处的现代延续,要有同行公认的清宫木匠传世绝技,还要有清宫木匠作坊的师承“学历”和师傅关系,这样才能获得历史认同。

长期以来,北京木作的名匠能在国家和政府权威部门的需求中,在高度紧张的时间内,施展祖传绝技,凭借对材质惊人的体悟,以高超的艺术理解力,创造出精美的手工产品。据龙顺成的工匠介绍,从清宫作坊行业过来的师傅接活以后,要是活少,就不睡觉,一连干一周,完成了再休息;如果活多,也很少休息,连续干一两个月,把活干完再说。老一代名匠从来不

① 北京档案馆藏《北平市政府警察局外五分局户》记:“原户主高庆龄久往不归更换户主高俊峰临时营业执照本铺在本巷。”全宗号:J181-6-1929-3,第289页,1947年。

② 王宁、谢栋元、刘方.《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5~16.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M](全55册).影印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误工期,他们的观念是,过去给皇上干活,制品要得急,不能歇着。现在龙顺成的工匠继承了这种观念,政府派了任务,工匠马上干,一定按时交活,制品优质,一丝不苟。

北京木作还保留了“能匠”的传统,即以工匠信仰为职业信仰,正所谓工匠有巧术。据文字学家考证,“它”的本意是巫,“‘巫’从‘工’,是说这种人能与神鬼通话,有超人的能巧。”^①从我们搜集到的历史文献和实际调查资料看,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工匠信仰很难说是巫术,而是佛道墨兼有。在工匠制作的精美器物中,有大量的皇室宗教仪式祭具,也有很多市民信仰器物。工匠把这种行业信仰集中到鲁班祖师身上,把木匠与诸神的沟通解释为行业技艺的一部分内容。其中,墨家崇尚鲁班,提倡简朴兼爱,重视工艺技术,在木作行业中思想积淀深厚,但墨家长期不属于城市社会史和宗教研究的范畴,因此鲁班木作的这一深层文化特征也多少被忽略了。

龙顺成的鲁班馆碑刻还反映了一个问题,即在清宫造办处解体后,宫廷工匠与城市社会重组,吸引了大批市民徒工,促成了工匠行业规模的扩大。从鲁班碑文看,在清末时期,北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动荡,北京木作工匠在就业出路上也产生了重大变化。一通同治碑描述说,从1862年开始,清宫造办处工匠开始流落民间。他们修庙立碑,成立个人作坊,操持行业,使北京木匠网络很快扩展到内外五城。《龙顺成简历》也持相同说法。^②但名匠是少数人,碑刻上记载了清政府给名匠颁发饷银的事,一方面证明了这种人才的稀贵,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皇室木作的萧条。清宫造办处的工匠以高级手艺立身,这时市民初级手艺人就业比率提高,绝世技艺与行业规模形成反差。张某,出身满族镶蓝旗,私塾9年,民国中期随父母迁往南城,父母送他拜著名老工匠为师学艺,师傅祖上几代人都是清宫造办处的领班。我们查了同时期的档案,当时鲁班馆有101户,90%以上是河北籍工匠,在其余10%的工匠师徒中,有42个北京人。张师傅回忆:“民国的时候,满族人要是没本事,住在城里也没用。”在清宣统鲁班馆碑中,记载了另一种相关的信息。当时皇室已完全丧失了在全国调集优秀工匠和优质木料的能力,于是北京柴木行悄然兴起,很多木工作坊为生存,开始以质次价廉的木材为原料,或利用贵族变卖旧家具的木料为储料,给城市寺庙修殿,也给普通市民打家具。木匠的门槛降低了,木作在这种背景下扩大了城市就业的吸纳力。当时城市的政治经济运行缓慢,但木行迅速膨胀发展,并迅速形成了行业密集化的趋势。

四、木作行业塑造城市社会风格

民国时期产生的同业会社组织对保存特艺行业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民国中期,龙顺成加入了营造业公会,鲁班馆成为公会的办公会所。与其他土木建筑业不同的是,龙顺成在公会中保持了自己手工斧雕的行业技术,名气大而铺子小。它一直沿袭清代皇宫传统,制作硬

^① 北京龙顺成中式家具厂办公室《龙顺成简历》打印稿,2006年,第5页。提供人:邸宝忠,男,北京龙顺成中式家具厂办公室主任。搜集人:董晓萍、蔡锦碧。搜集时间:2009年8月11日。搜集地点:北京龙顺成中式家具厂。

^② 王宁、谢栋元、刘方.《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6.作者只讲到巫,尚未涉及墨家。

木器具,还为此保留了一套特殊工艺程序。比如,在硬木器具制造上,我国的硬木材质来自南方,南方潮湿,北京干燥,北京的木匠造好硬木木器后,即便有再好的手艺,都会出现使用者不适或木器不好用的现象。木匠还要继续施展精湛手艺,利用一段时间,对木器进行连续调修,最后才能达到人物合一的境界。对此,龙顺成的工匠说:好的硬木产品,“造就是修,修就是造”,“皇宫的文物也如此,修的文物,也是文物。”由于这种特点,龙顺成的空间利用也一直沿袭传统做法,前店后厂,前作后寝,保持大货库、小厂房的格局,以便为木器修活留足场所。

北京传统行业是北京城市风格的窗口。北京木作行业所具有的“前后式”公共空间格局,正是这方面的一种遗产。所谓“前后式”,即前述前店后厂、前作后寝和前修后造。木作行业根据城市行业技术程序的要求,同时根据行业资源贮存的环境特点、城市社会阶层需求层次的选择以及城市人口消费能量的不同,采用前后空间切割作业和连体供应的方法工作,按需生产,短线供应,做到了供货繁荣而节省成本。至今北京的很多行业老字号还保留了前店后厂的经营方式。就城市社会构成史来说,这种格局,提供了城市自然景观与历史建筑景观搭配、城市房产租赁与土地权利协调、城市资源节限与等量消费共同计算等运作模式。

五、结 论

清宫造办处木作制品曾经是上层阶级享用的宫廷用品,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存在着较大距离,无法对全社会产生影响。但它们在集权制度下成为了绝世精品,集中了城市手工业文化的要素,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1949年后,经过工业化和复制化,北京的一些手工行业转型为国家出口行业。1979年改革开放后,又经过旅游化和商品化,手工行业产品部分地演变为大众文化产品。近年我国政府积极开展非遗保护工作,在以往行业文化保护工作的基础上,重点保护这批高端精品的历史文化模式和手工技艺精髓,促进特种文化传承。

就木作个案而言,也许我们没有必要急于把不同的问题连成同一种北京城市社会史的解释脉络,而应该把它们分层次、分阶段地放在各自的位置上。我们所得到的个案也可能不是学者最初想要的理想对象,但是,它是北京社会史资料所能呈现给我们的。从龙顺成的个案大体可见,行业是实物精品及其文化含义的创造者,会馆是把行业的精神传统、行业公产和行业利益最大化的城市历史机制。具有古老传统、天才创造性和朴素生活习惯的能工巧匠们,在营造北京历史城市时,也创造了皇家艺术极品和市民生活装饰要素。

[收稿日期]2010-09-30

[作者简介]董晓萍,女,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北京 100875

Lu Ban's Woodwor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Beijing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Public

Dong Xiaopi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ase study of the culture of handicraft professions in Beijing based on the Qing palace Zaobanchu archives and fieldworks.

Key words: Qing palace Zaobanchu archives; culture of handicraft professions; social history of Beijing